

“非人类叙事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情感理论、动物理论、新物质主义理论、媒介理论以及思辨现实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激发和影响,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一轮声势浩大的“非人类转向”。这一转向无疑为叙事研究提供了契机。在现实的物理世界中,叙事作品是由人类书写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但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叙事作品所呈现的不一定是人类的故事或人类的经验,也可能是对非人类的故事或非人类的经验的再现。将非人类叙事纳入讨论和考察范畴,既可以丰富和扩展现有的叙事理论,使之更加完整,也可以对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非人类叙事文本做出应有的批评和阐释,进而加深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使人类更好地介入生物圈和建构更大的有机体。本专栏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视角切入非人类叙事研究,值得阅读与关注。

——尚必武

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技术与人类

袁欣悦 尚必武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技术曾被视为天赐的偶得之物,人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技术史。进入后人类社会,人类与技术紧密联结似乎并未带来想象中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悖论式的未来。基于对科技时代的敏锐观察,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再现人类与技术的耦合,并借此追问人类与技术的悖论:与技术的结合使人类更加虚弱,甚至使人类存在价值陷入虚无。技术真的能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吗?通过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小说揭示科技时代人类的两难境地,寄寓着石黑一雄对技术和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技术;人工智能;后人类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5-0001-08

0 引言

人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技术史。正如未来学家拜伦·瑞希(Byron Reese)指出:“事实上,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改变只有三次。每一次都源于技术,但不仅仅是一项技术,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技术,它们以根本的、永久的,甚至是生物的方式改变了我们。这就是技术。”(2020:VII)其中,“计算机的进步超过了所有技术。它们不仅仅是小玩意儿,还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装置……有些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计算,包括你的大脑、宇宙、空间、时间、意识和生命本身”(2020:27)。然而,技术将人类引入的似乎并非

收稿日期:2022-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17ZDA2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欣悦,女,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叙事学、儿童文学研究。

尚必武,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袁欣悦,尚必武.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技术与人类[J].外国语文,2022(5):1-8.

理想中的乌托邦,而是未曾设想的陌生世界。更准确地说,科技以服务 and 提升人类为初衷,而现代科技的普及和发展却使得人类的价值和地位被迫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成了陌生地上的陌生客。曾是明确、牢靠的现实突然变成了梦幻,不如艾丽丝漫游过的镜子仙境那么美妙。”(里夫金等,1987:219)或如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言:“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转折之中——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转折首先就是这样一种含蓄的力量。”(斯蒂格勒,1999:1)与“含蓄的转折”不谋而合,在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以其一贯静水流深的笔法,围绕人与技术这一母题,书写了一个看似琐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未来故事。在石黑一雄构想的未来,人类与技术的耦合已几近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悖谬的是,人类一方面屈服于,甚至寄希望于科技的强悍,企图借此弥补缺失,但同时工具理性的冰冷又让人们的技术产生深刻的怀疑、畏惧乃至痛恨。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石黑一雄试图探讨人类追求技术的悖论:人类和技术是怎样彼此交融的?技术真的能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吗?

1 技术的美梦,抑或技术的噩梦?“基因提升”之悖论

克拉拉的机械眼为读者呈现出科幻感十足的未来城市景观。小说开篇多次聚焦克拉拉视野中的PRO大楼:“那是我第一次看清PRO大楼其实是由许多不同的砖块构成的;与我之前的想法不同,它也不是白色的,而是淡黄色的。我还能看出,它比我想象的要高——有二十二层楼高——而每一扇千篇一律的窗户下面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窗台。”(石黑一雄,2021:10)PRO大楼成为未来城市生活的隐喻性地标:高科技已然融入人类日常生活,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左膀右臂。当克拉拉被展示在商店橱窗中,孩子们与她热情互动,“他们似乎也很高兴看到我们。孩子们会兴奋地走上前来,有时一个人,有时跟着大人,然后指指戳戳,哈哈大笑,扮鬼脸,敲玻璃,冲我们招手”(11)。克拉拉纯真的视角为读者描摹出几近童话般的人机伴生景象。“看,那边!你看到了吗,克拉拉?那个男孩好爱他的AF呀!噢,瞧瞧他俩一起哈哈大笑的模样!”(21)技术已然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生活井然有序、智能高效,人类与机器人彼此伴生,和谐共处。然而,未来当真如此美妙吗?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幅由克拉拉的视角展开的美妙图景中,科技带来的阴云却始终挥之不去。譬如,“因此我们能够看着外面——行色匆匆的办公室工人、出租车、跑步者、游客、乞丐人和他的狗、PRO大楼的下半截”(3);又如“这时,污染变得更严重了,哪怕从杂志桌那一侧,我也看不到天空的缝隙了,而窗玻璃本身——玻璃工人们如此骄傲地替经理将它擦亮——也满是污点”(36)。“乞丐人”和遮天蔽日的“污染”就如同交响乐中的刺耳噪音,无时不提醒着人们关注这场科幻美梦的裂隙。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美梦与噩梦的相互并置突出表现在被滥用的基因编辑工程。小说中,基因编辑成为一项在富人阶层普及的优生技术,在文中称作“提升”(lifting)。女孩乔西便是接受过“提升”的儿童,被认为比普通的儿童更具天赋,更加符合社会期待,因此“提升”也被认为是技术给予孩子们的祝福。谈及未接受“提升”的男孩里克时,大人们扼腕叹息:“看上去还挺聪明。真可惜,这样一个孩子居然错过了机会。”(85)尽管如此,被寄予厚望的基因工程技术却带来噩梦般的后果,原因是人成为技术的实验品。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风险一直为学界关注。在《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中,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勾画未来生物技术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最为影响深远、前景难料的阶段就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2016:84)——优生学,即利用基因技术选育后代。基因工程之所以令人忌惮,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后果难以预料。“对某一特定的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

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基因更改时没有被察觉,他们可能数年甚至隔代才能体现。”(79)文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情节暗示:基因工程的副作用极有可能就是乔西的病源,同时也是乔西的姐姐萨尔患病离世的主要原因。在请求克拉拉延续乔西时,母亲透露出两位女儿的病与基因提升技术之间的微妙联系:“萨尔出事之后,他说过我们不能再冒险了。就算乔西不接受提升又怎样?许多孩子都没有接受。但我绝对不能让乔西过上那样的日子。我只想给她最好的。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268)在作品中,基因提升的副作用是成人之间颇为忌讳的敏感话题:

“噢,克西丽。我真抱歉。我有时候真蠢。我只是想说……”

“那是我们最大的恐惧,”边上一个比较沉着的声音说道,“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

“我们中的有些人比较幸运,另一些则不那么幸运。”一个黑皮肤的女人边说边向前一步,亲切地碰了碰母亲的肩膀。(85)

尽管基因提升技术被父母视作科技给予下一代儿童珍贵的机会,但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仍然犹如挥之不散的阴云萦绕在人们心头,是家长们“最大的恐惧”。自然界高度的复杂性难以穷尽,因此难免会有乔西和萨尔这般“不那么幸运”的例外情况出现。尽管只是统计学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点,背后却是两个孩子的命运,沉重的童年以及无法挽回的破碎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乔西和萨尔是以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为代价,成为基因技术的实验对象以及人类改造人类这一幻梦的祭品。

除去难以预料的生理病症,基因提升的副作用还加剧了社会割裂和人际隔阂。小说中的女孩乔西和男孩里克曾是童年挚友,然而,里克却未曾接受过“提升”,因此二人不得不面对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最终分道扬镳。里克曾直言不愿参与乔西家的聚会,因为“我不属于这里。这是一场提升过的孩子们的聚会”(103)。谈及和乔西的未来时,里克表示:“我们只能祝福彼此,各奔前程。要我进大学,去跟那些接受过提升的孩子们竞争,那是根本行不通的。”(366)诚如福山所言:“如果富有的父母突然有机会能提升他们孩子以及后代的智力,那么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2016:19)被资本裹挟的基因技术成为富人的特权与上层阶级的优生游戏,成年社会的精英政治提前渗透进孩子们的童年。经过“提升”的孩子与自然出生的孩子自出生起便分属于两个世界,而社会阶层由此显化为生物意义上无法弥合的鸿沟。此外,乔西与里克的对立也预示着“人工人”与“自然人”的对立。人类意志开始左右自然选择,自身也逐渐从自然状态中离席,不再因自然之子的身份引以为傲,转而热诚地推崇与信奉技术所创造的“类似‘狮身人面像’的生命奇观”(斯蒂格勒,1999:101),并由此形成未来社会中一种新形式的种族隔离。经人工改造后的乔西被认为拥有更为高等的智识能力,是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现代性花园中被精心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2002:25);而里克则被认定为“应当被刈除的杂草”(25),无法享有和乔西对等的社会认可和教育条件,“被隔离、控制、阻止蔓延、转移并被保持在社会的界限之外”(124)。对“人工超人”之生命奇观的痴迷引向第三点。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福山指出:“人类基因工程几乎与另一种优生学的前景直接相联系。优生学一词,让人产生所有的道德联想,意味着人类最终有能力改变人性。”(2016:73)随后福山进一步阐释人类为什么应该忌惮生物技术:“未来,我们将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只是手法更加科学、方式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选育已经不必要有‘国家力挺’的内涵,更适当的表达是,它显示了基因工程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2016:87-88)基因工程之所以令人感到不适,事关人类尊严:曾一度被认为是神圣和奇迹创造下的人类,如今却成为冰冷计算下“物质性后果的总和”(2016:89)。人

类习惯性地借助技术弥补生物性缺陷,却由此将自身引向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当人类的本质遭到技术的更换和篡改,人类还能被称之为“人类”吗?

聂珍钊曾将伦理悖论(ethical paradox)定义为:“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2014:254)如果认为技术是祝福,“提升”下一代是符合伦理的选择,那么人类则将面对棘手的副作用,加剧的社会割裂以及去人类化的人类未来,而这无疑是不符合最初的伦理期待的。人类企图利用技术掌控自然选择,通过修改和筛选基因弥补天然的不足,以此制造更加强大的下一代,然而,这一初衷却使下一代更加孤独,更加脆弱,这也正是《克拉拉与太阳》中众多角色命运的悲剧之源。乔西接受基因改造的失败与其说映射了石黑一雄对于现阶段生物技术的不信任,不如理解为一种广阔意义上的隐喻。技术带来的结果往往和最初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其质变过程如同“黑箱”,令人不得而知,而其后果却总是让人难以承受。

2 人类之爱,抑或机器之爱?“人机互替”之异象

如果说基因工程是人类从生物的角度弥补自身缺陷,那么陪伴型机器人 AF 的出现以及用机器人替代离世的乔西便是人类试图利用技术弥补情感方面的缺失。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女孩乔西在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生活,而母亲工作繁忙,乔西也因患病只能过着孤独的生活。作为成长期的儿童,乔西本应享受来自父母和朋友的关爱,但日常陪伴在乔西身边的却是机器人克拉拉。拥有着敏锐观察力的克拉拉洞悉了乔西的孤独:“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如果她没能陪伴母亲喝那杯匆忙的咖啡,她一整天都有可能被孤独感所渗透,无论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来填充余下的时间。”(63)身为陪伴型机器人,克拉拉实际上代替的是乔西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母和朋友角色。诸如克拉拉等 AF 机器人的出现和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侧面证明了未来社会中人类巨大的情感空洞,存在着大量孤独的“乔西”和匆忙的“母亲”。反之,如果说克拉拉在乔西的视角里替代的是其缺席的父母,那么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克拉拉则被期望替代即将缺席的女儿。让克拉拉替代乔西,机器替代人类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在大女儿萨尔离世后,母亲无法再次承受女儿离世的打击,于是她向克拉拉乞求:“我在请求你让这个办法奏效。因为如果那件事发生了,如果那一天又来了,我是没有第二条活路的。萨尔那一回我挺过来了,但我没法再挺一回了。所以,我请求你,克拉拉。请你为了我尽你的全力。”(267)母亲寄希望于由克拉拉来填补由女儿离世带来的情感缺失,试图通过延续计划,由机器人来承担亲缘关系中女儿这一角色的情感功能。在这段看似完整的人类情感连结中,无论是从哪一方的角度出发,都必然出现另一方的缺席,负责填充空缺的则是技术。甚至,人类主动要求技术来填补情感方面的缺失。由此构成小说中诡异的未来景象:在曾被视为人类无可撼动的绝对领域——情感层面,为了弥补缺失,人类主动让渡自身的权力和空间,交由机器占有和入侵。

但是,人类的主动弃权能够弥补情感的缺失吗?乔西与母亲的相处并不融洽,而是存在着种种欺瞒与隔阂。母亲瞒着乔西进行延续生命的计划,哄骗乔西那只是在为她画像。母亲无法像在克拉拉面前一样,向女儿袒露自己的脆弱和恐惧,因而乔西也无法领会母亲阴冷外表下的心情。无论一切是否出于母亲“善意的谎言”,这确实加深了两代人的隔阂,导致母女间无法坦诚交心。同样,相比起和克拉拉相处时的轻松自在,乔西与母亲相处的画面却充满着不和谐:

“你为什么要玩这样一个游戏呢,乔西?一个会让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游戏?”

乔西继续耐心地回答了母亲一会儿,但很快笑意就从她的声音中消失了。最后她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就是一个她爱玩的游戏,而母亲则追问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且似乎动起怒来。(116)

乔西本意与母亲分享她喜爱的游戏,而游戏中出现的死亡却触碰了母亲最脆弱的神经。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神经质地质问乔西为何进行这样危险的游戏。虽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克拉拉并未对情景作出过多判断,但我们还是能从“笑意就从她的声音中消失了”、“一遍遍地重复着”等细节处推断乔西与母亲之间并不流畅的交流以及乔西从欣喜到失落的心态转变。正是缺乏真实的接触与坦诚的表达,让这段对话仅仅停留在“对话”的层面,无法被称作“交流”。母亲不曾向乔西坦言自己的恐惧和痛苦,相比起尝试与眼前真实的乔西沟通,反而寄希望于由克拉拉复制的“乔西”,而乔西虽不能理解母亲为何突然暴跳如雷,但也默许此般情状,不作努力向母亲探寻缘由。“言”止于此,“情”无传达,因而尽管对话双方看似在场,但面对的却只是自己话语的回音。

若跳出克拉拉的视角,不难推断,母亲和乔西之间脆弱的关系仅仅只是未来社会中人情隔阂的一处缩影。事实上,向机器投射情感需求,使得人类理想的亲密关系更加难以获取,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也愈加脆弱。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曾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就科技渗入人类情感关系表达了隐忧:“社会型机器人的功能既是一种症状,又是一种梦境。作为症状,他们提供了一类途径,能够回避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作为梦境,他们表达了一种希望,希望突破现有的人际关系局限,使得人与人之间既能亲密无间,又能回归自我。”(2014:12)机器提供的情感代偿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愈加遥远,真实的亲密关系将成为永远的梦境。“用技术来处理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会被弱化成仅仅是联系而已。”(2014:17)在真实性失去价值的未来,向机器寻求情感慰藉,利用技术弥补情感缺失固然能够暂时逃避现实亲密关系中的痛楚,然而关闭电源、在太阳的暗处,人类终会发现自己依旧漂浮在无边的孤独之海。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Alastair Reynolds)在科幻哲学短篇《齐马蓝》中,描写了令不少读者深有同感的一类科技病症——对电子备忘录的深度依赖。小说中的备忘录助手作为人类主角的体外记忆贮存空间,喧宾夺主地几乎取代了人类本身的记忆和思考能力。“我张了张嘴,似乎想回答他,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一般来说,在提问和回答之间的那一瞬,AM会默默地引导我选择两个选项中的一个。没有了AM的提示,我的思绪就像是陷入了心理停滞。”(2021:9)丧失了记忆愿望和能力的人类变得迟钝缓慢、寸步难行。无论是情感还是记忆,对机器的依赖表明人类和技术的纠缠已密不可分,技术已然构成整个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反馈回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出于掌控欲和安全感而向技术寻求帮助,但这样的选择却恰恰使人愈加失去对真实的掌控。对于许多信奉科技改变人类命运的读者来说,或许《克拉拉与太阳》为我们描绘的未来景观远非预期中那么美好:在技术的拥簇和庇护之下,一如温室花朵般孱弱的人们孤独地生活在精心打造的更加割裂、封闭、疏离的社会景观之中。

3 人类利用技术,抑或技术异化人类?“死者回归”之迷思

技术不仅使人类在现实层面更加脆弱,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技术还使得人类的形象变得支离破碎。这一点着重体现于小说的核心事件,即用克拉拉替代乔西。能否利用技术使死者得以回归,是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又一重要议题。“死者回归”所涉及的问题是:如果死亡是人类痛苦和恐惧的终极来源,那么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是否可以借此消除死亡?就小说设定而言,这一想象已然成为现实。利用克拉拉替代乔西的计划的主要执行者科学家卡帕尔迪就这样相信:

我们这代人依然保留着老派的情感。我们的一部分自我拒绝放手。这一部分自我仍然执着地想要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内核中都藏着某种无法触及的东西。某种独一无二、无法转移的东西。我们必须放手,克丽西。那里什么都没有。乔西的内核中没有什么是这个世界的克拉拉所无法延续的。(264)

于他而言,克拉拉能够完美地学习并“再现”乔西,从而延续乔西的生命,亲友挚爱也无需承受失去乔西的痛苦,而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放弃过时的思想,拥抱新的生命形式。然而,即使承诺这般美好,是否要用克拉拉取代女儿对乔西的父母来说依旧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卡帕尔迪口中所谓“老派的情感”令人如此难以割舍?一个可想的答案是,人类被技术异化的痛苦。

死亡是哲学史中古老而严肃的话题。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言:“学会生活,这应该意味着学会死亡,为接受死亡而重视死亡的绝对性(没有拯救,没有复活,也没有救赎),对自我和他人一样。”(2006:4)对于德里达而言,真正的哀悼就在于死者之于主体的不可内化。在《罗兰·巴特之死》中,德里达说道:“罗兰·巴尔特注视着我们……它就在我们之中,但却不为我们所拥有;我们无法像拥有我们内在性(interiority)中的一部分一样来拥有它。”(2001:44)同样,在《致保罗·德曼》中,德里达再次谈及哀悼中他者的绝对性:“失败的内化在另一方面就是对他者身为他者的尊重,是一种温和的婉拒,也是一种弃权行为,让他者保持独立,存在于主体之外,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另一边,同死亡为伴。”(1988:35)回到文本,小说中人类无力直面死亡,便转而向技术求助,使死者回归生的世界。这一选择看似能够巧妙地借助外力规避痛苦,消除死亡的威胁,实则却抹杀了死者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技术替代使人丧失哀悼的能力,因其拒绝承认死者作为主体掌控不了的绝对客体而独立存在,并企图将他者、与他者的死亡一同纳入“我”的意识 and 行动范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通过机器替代来实现“死者回归”实际上消解和降格了他者的死亡和他者的主体性,从而抹杀了他者这一形象。无论出于多么深刻和不舍的爱而选择利用机器复制乔西,严峻的事实是,由机器复制的乔西只不过是承载生者感情的载体或工具,是一块投射孤独和欲望的全息屏幕,是僵死的算法和程序,而不再是具有“流动的,语境的”(海勒,2017:271)具身性的独立个体。

同时,替代技术也使人类质疑自身是否能够被机器所复制、取代,而技术是否能够全面解构人类的特性和神秘性。机器人克拉拉的凝视之眼在带给读者陌生化的阅读体验之余,也暗示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人类被技术所审视和解构,被有意强调的叙事者非人身份强化了这一认知。克拉拉的叙事中充满了各式怪异措辞,譬如她将太阳的光影称作“地上太阳的图案”(4);以物品冠名人类,“咖啡杯女士”(28)和“雨衣男人”(28)。克拉拉的机械质感愈是凸显,她投以人类的凝视就愈加令人不安。当母亲流露出复杂的表情时,克拉拉形容道:“母亲朝我探过身来,身体越过桌面,眼睛眯了起来直到她的脸占满了八格空间……在一格中,譬如,她的眼睛在残酷地笑着,而在下一格中,这双眼里又满是悲伤。”(131)通过克拉拉的内聚焦,小说逼真而近乎残忍地呈现了人类的形象如何被机器扭曲、拆解、降格成为电子屏上一个个冷漠的单元格。

情感可以被解构吗?人类可以被计算吗?在小说中,卡帕尔迪是技术理性的坚定信奉者。人类是“可以被装配和分解的系统”(海勒,2017:271),从而更加便于操控和掌握。人心之谜不过是原始蒙昧时期的诗学隐喻,死亡之恸也可以通过数据复制轻易消解。但问题在于,人类真的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吗?吊诡的是,人类企图利用技术消弭脆弱,武装自身,却最终被迫面临着一场更为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这对于人类而言无疑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父亲的一番话真切再现了后人类时代中人类的精神分裂:

我想,我之所以恨卡帕尔迪,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怀疑他也许是对的。怀疑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怀疑如今科学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我女儿身上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东西,任何我们的现代工具无法发掘、复制、转移的东西。古往今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人们彼此陪伴,共同生活,爱着彼此,恨着彼此,

却全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一种我们过去在懵懵懂懂之中一直固守的迷信。(283)

一方面人们无法拒绝科技强硬的逻辑,难以抗拒技术的入侵;另一方面,承认自身并不具有独特性和存在意义,又是人们最不愿接受的事实。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在梳理控制论发展史时评述道:“如果人类意识到根本没有自我,接下来就会产生恐惧与痛苦……当自由主体被认为自始至终是一种幻觉时,它的各种界限不再大量地被穿透、延伸或者溶解。”(2017:206-207)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看似沉静平缓的叙事之所以依旧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张力十足,就在于石黑一雄精心架构的核心悖论——人类希冀依靠技术规避脆弱、掌控风险的强烈愿望,最终却招致更大的脆弱和指向人类自身的毁灭性打击。由是说来,《克拉拉与太阳》提请读者重新思考并审视现代性叙事和语境——用技术祛魅人性,用理性替代感性,用算法编码灵魂。

在《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斯蒂格勒写道:“自我主宰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本性。那么,技术是否是我们能够征服自然的手段?或者技术在成为自然的主宰的同时,是否也将自然之一部分的人也征服了呢?”(1999:29)技术异化人类命运,“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1999:100)。这是斯蒂格勒在书中着重讨论的现代技术悖论。正如小说所展现的,人们追求技术,希望借技术之手强化自身,抵抗所有脆弱和孤独的可能,而现实却与预设南辕北辙。人类无法接受死亡,于是要求技术抹杀死亡,却与此同时也消解了他者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特殊性和意义感,甚至于使人类的存在滑向虚无的深渊。技术提供的避风港和安慰剂并未使得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更加孤独、更加虚弱。科学的初衷是以技术为辅助,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实现人的价值,然而在这样的未来景观中,当人的本质遭到物质篡改,情感被机械阻绝,命运被技术异化,人便从技术的主宰者沦为实现技术的手段和对象。

4 结语

对技术的渴望源自人类的“原始性缺陷”(斯蒂格勒,1999:20),而人类也因此踏上与技术结合,改造自然的漫长征途。然而,当人类永恒进步的幻梦导致人类频频陷入两难,甚至令人的存在滑向虚无时,启蒙运动式的进步旗帜开始使人反思。《克拉拉与太阳》的文本基于两个相互摩擦的界面之间,一面是技术与理性所许诺的美丽新世界,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人类社会灾难性变形。小说文本在此间不断游移,呈现出变幻的、诡异的未来图景,并由此追问被普遍信奉的“现代性颂歌”(modernity's mantra),即“理性的、制度化的科学文化可以掌控自然,并将风险和不确定性降至最低”(Farzin,2021:10)。

如若说在《别让我走》中,石黑一雄展现人类对技术不加约束的滥用,而《克拉拉和太阳》展现的则是技术之于人类自身的威胁乃至驾凌。也因如此,在《克拉拉与太阳》温情脉脉的叙事背后,在克拉拉的凝视之外,在太阳的暗处,潜藏焦虑与忧思。“基因提升”“人机互替”与“死者回归”三个小说议题,共同指向人类试图通过技术掌控一切的启蒙主义式的热情,更确切地说,是试图利用技术实现对人类自然状态的修改以及固有极限的超越。技术能否使人类更加强大?如若这个命题的确令人怀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身处“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福山,2016:173),是否仍有值得人类坚守的阵地?透过克拉拉的非人之眼,石黑一雄重现对回归人类个体价值的呼吁,即保留感情,包容个体差异,尊重流动的、鲜活的人类具身性。人性来源于此,人与机器的区别来源于此,而弥足珍贵的爱也来源于此。

参考文献:

- Derrida, Jacques. 2001. The Deaths of Roland Barthes[G]//Pascale-Anne Brault & Michael Naas. *The Work of Mourning*. Trans, Pascale-Anne Brault & Michael Naas.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1-68.

- Derrida, Jacques. 1988. *Memories, for Paul De Man*[M]. Trans, Cecile Lindsay,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arzin, Sina et al. 2021. *Under the Literary Microscop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Novel*[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 2021. 齐马蓝[M]. 陈楸帆, 刘慧颖,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拜伦·瑞希. 2020. 人工智能哲学[M]. 王斐, 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 贝尔纳·斯蒂格勒. 1999. 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弗朗西斯·福山. 2016.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黄立志,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杰里米·里夫金, 特德·霍华德. 1987. 熵: 一种新的世界观[M]. 吕明,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凯瑟琳·海勒. 2017.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M]. 刘宇清,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丁·海德格尔. 1996. 技术的追问[M]//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924-954.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齐格蒙·鲍曼. 2002. 现代性与大屠杀[M]. 杨渝东, 史建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石黑一雄. 2021. 克拉拉与太阳[M]. 宋金,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文中未标明出处的页码引文, 均出自该书).
- 雪莉·特克尔. 2014. 群体性孤独[M]. 周逵, 刘菁荆,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雅克·德里达. 2006. 最后的谈话:《我向我自己开战》[G]//夏可君, 等. 解构与思想的未来.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YUAN Xinyue SHANG Biwu

Abstract: Technology was once regarded as an endowed gift.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 to some extent, can equal to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Entering the post-human tim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seems not to bring the utopian future as expected, but rather a paradoxical one. Based on his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age, Kazuo Ishiguro represents the coupling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echnology in *Klara and the Sun*, revealing the paradox of technology. The splicing with technology makes humans more fragile and even calls the value of human existence into question. Will technology make humans stronger? Questioning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Klara and the Sun* unveils the dilemma of human beings living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conveying Ishiguro's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on technology and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Kazuo Ishiguro; *Klara and the Sun*;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thuman

责任编辑:冯革